



我的姑妈

□ 董卫童

我的姑妈如果还健在的话,今年应该是102岁了,她八年前过世时,我们所有的侄男侄女齐聚老家,为她守灵送葬。葬礼是由她婆家晚辈办的,仪式之重,让我们深受感动。

姑妈年轻时上过几年私塾。18岁就嫁给了邻镇的裴家,可仅隔一年,丈夫就因病去世。婆家很开明,让她回到娘家改嫁,可她回家后一直未嫁,帮助兄弟姊妹、侄男侄女,抚养晚辈,孝敬父母,走完了一个传统中国女性贤孝的一生。

姑妈回娘家时,抗战还没结束,我的大伯、二伯在抗日的学潮中参加了革命,家里只剩我的父亲和已过半百的爷爷奶奶。为了能够照料他们,姑妈推掉了许多相亲,不再考虑自己的婚事。

解放后,姑妈才20出头,伯父给她安排了一份城里的工作。这时我父亲也已离开家乡,去外地求学了。当姑妈踏上前往城市的帮船,看到两位送她出行的老人时,她的心碎了,毅然决定留下来尽孝。这一留又是20多年,直到为两位老人养老送终。在这期间,她还帮助我远在新疆工作的大姑妈抚养了两个孩子。

姑妈心灵手巧,解放后学会了缝纫做衣,靠着这门手艺养活自己,拒绝了兄弟姊妹对她经济上的帮

助。送走两位老人后,她每年都要在三个弟兄家轮流小住一段时间,为兄弟的子女做一些衣服,或翻新一些旧棉衣等,以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。

姑妈一辈子总是为别人着想,从未向兄弟姊妹提出过半点要求。文革后落实政策,家里的祖产归还了我们,并由姑妈负责出售。兄弟姊妹一致同意,所售钱款留给姑妈,作为她晚年的养老基金。但她坚决不同意,一定要平分,自己只留一份,并说:“你们虽然都在城里工作,但还要抚养子女,负担也不轻。我孤身一人,还有缝纫手艺,能养活自己。”

记得我结婚那年,姑妈来帮忙做衣服。当时我二弟刚分配工作,三弟大学还没毕业,家里经济并不宽裕,其中有一张600元的定期存折,离到期还有半年,如果提前取出来,会损失100多元的利息。我父母商量此事时,被姑妈知道了,她对我父母说:“明天我有急事,要回老家一趟,两天后就回来。”两天后,她从老家带来500元现金,说:“你们不要取未到期的钱了,这500元先给侄儿置办酒席用吧。”这时我们才知道,不多言语的她,心如针细,善若春风。

姑妈过了80岁后,不再从事缝纫工作,住进了当地的养老院。由于没有子女,属五保户,费用由政府

承担。但平时的日常生活,总是需要一些钱的,我们侄男侄女会在四时八节给她寄点零用钱,但她从不乱花,并告诉我们:“我钱够用,不必再给了。你们给的钱我都存着呢,等我百年以后,再退给你们。”到了90岁,姑妈的身体已大不如前。我们和养老院的领导联系,愿意多花点钱,给她一些特殊的照应,可除了从原来的三人间换成单人房外,其它的照应她一概拒绝了,并说:“我粗茶淡饭吃惯了,让我改变生活习惯,还不适应。”就这样,姑妈活到了94岁。

姑妈病重的那年,我们去看望她。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,她对我们说:“我这辈子没有子女,但有这么多的侄男侄女,我很知足。最后有个心愿,不知道能否实现。”我们问她什么心愿,她说:“我18岁嫁到裴家,虽没留下一男半女,但也算是裴家的人了。如有可能,帮我找到裴家的后代,看我能否进裴家的祖坟,和丈夫合葬在一起。”我们通过努力,找到了裴家的后代——她的外侄。听了我们的介绍,对方十分感动,并在弥留之际将她接到了裴家。

姑妈下葬那天,天上下着大雨,送葬的队伍连绵数十米。这对只生活了一年的夫妻,76年后团聚在了一起。

我的外婆

□ 张传界

柴火“噼里啪啦”地烧着,间或夹杂着外婆被油烟呛出的轻轻的咳嗽声。外婆信佛,每天起来头一桩事就是焚香,淡淡的檀香味氤氲整个屋子。那一刻,我觉得格外安心,钻在暖暖的被窝里更加不肯起来了。直到一家人该吃早饭了,外婆才来唤我。她时常单独给我煮两个鸡蛋,说是吃了有营养,长个子。

外婆晚年吃斋,几个舅舅常常买豆腐、豆皮回来。她喜欢用香菇或咸菜炖豆腐,用茼蒿或慈姑和豆皮做汤。每次做了,总先盛给我一碗。那浓浓的豆香味,至今还在我记忆里飘着。

外婆在村里很受人敬重。我想,这不单是因为她年长。她这个人,从不与人计较,不争不吵,更不会在背后议论别人。她只是本着一颗善良的心,默默地关心着周围的人。邻居家的猪拱了她的篱笆,踩了她的菜地,她不声不响地把篱笆修好,还帮忙把猪赶回圈里。邻居们忙的时候,把孩子交给外婆照着,从来都是放心的。谁家有个红白喜事,她也主动去帮忙料理,从不图什么回报。

晚年的外婆也爱到我家来

住。从她家到我家,步行要个把钟头。说是来玩,不如说是来帮她的“老巴子”女儿做家务。那时我家农活多,父母整天在地里忙,我和哥哥又要上学,家务活没人做。农忙一到,外婆就来了,帮忙做饭、喂鸡、喂猪。有一桩活计我至今记得清楚——外婆劈蚕豆的功夫实在了得。她端出一大盆晒得干透的蚕豆,又找来砧板和菜刀。那些蚕豆硬得像小石子,灰褐色的皮皱巴巴的,像风干了的老人脸。她捏起一颗按在砧板上,右手拿着菜刀,用刀刃最下面那个刃角,轻轻地按在蚕豆的“肚子”上,两手同时一抬一落,“咔”的一声,蚕豆便齐齐裂成两半,蹦出两瓣黄灿灿的豆瓣来。劈蚕豆最讲究力道——轻了劈不开,重了劈碎了,还容易伤到手。外婆的手上有准头,“咔、咔、咔”,一盆蚕豆不一会儿就劈完了。她喜欢用泡发的蚕豆烧瓠子汤,或者烧咸菜汤。直到现在,我仍对这两种汤情有独钟。

外婆走的那年,我因为刚参加工作,在遥远的异乡,没能赶回去见她最后一面。母亲说,外婆走得很安详,像是睡着了一样。我这才想起来,小时候每次跟外婆睡,她都替我掖好被角、把棉袄搭在我身上时,总是轻轻地说:“睡吧,外婆在这儿呢。”那声音,现在还在耳边。

外婆走了多年了。可我觉得,她一直没有走远。

慢弯了,不再像从前那样挺直。他坐下来修鞋的时候,神情特别专注,低头默默干活。那双布满老茧的手,穿针引线、缝补、敲打,动作熟练利落,不急不躁,每一处都修得细致周到。再难修补的鞋子,到他手里都能修好。他坚守祖传老手艺,也会搭配一些新式小工具,活儿做得地道靠谱,来过的顾客没有不满意的。

一辈子守着一个摊,一辈子专心一门祖传手艺。平凡的老街匠人,用一生的坚守,留住了老街的烟火气,也温暖着我们一代人的回忆。

外婆家的西坝头

□ 陈仁存

来我们里下河,如果没有看见鱼簖、风车就等同白来了。取鱼的背着鱼护篓子,穿着蓑衣,戴着斗笠。不远处,有吱吱咯咯悠悠转的风车。高高的蓝天下,有一望无际的稻田,有蛙声,有苦恶鸟的叫声,有水天一色的渺茫。这就是里下河水乡的一张画。外婆家的西坝头有一个鱼簖,我小时候就看见它在,一直都在。

外婆的家住在一个小单屋子里,三间顶头房,掩映在一片竹林子里。竹林子里的鸟儿一早一晚总是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每当我们去外婆家,都是大姐走在前头,二姐、三姐将我夹在中间跟在后面,到西坝头的时候外婆就看见我们。西坝头离外婆家三四个田头子远。然后就是表姐来接我们。谁不想一步飞到外婆家呢?

外婆说表姐迎接我们太慢。她的眼睛早已眯成了一道缝,喜不可言。外婆叫“细眼睛奶奶”。舅舅已经将取鱼的家伙拿在手上。表姐撑篙,舅舅撒网。从西坝头开始,我们沿河塘子上跟着跑,还有庄上好多“看呆”的大人小孩,惊呼声不断。跑了老远,到一个有风车的地方,再向东南三垛方向,鱼簖一个接一个,风车一个接一个,这里叫东坝头。太阳已经渐渐落山。舅舅接过表姐手上的撑篙,猛一篙下去,小船儿箭一般在溅起的浪花上飞也似的,快到西坝头他就将撑篙挑起,让船儿顺风行走。这是满载而归的样子。舅舅又一撑篙从船上一跃上岸,用撑篙钩住船帮让表姐上岸。表姐提着里面活蹦乱跳的鱼篓。表姐个子不高,细大眼睛,唇红齿白,十六岁。

在外婆家的日子,天天都是鱼打滚,咸菜煮杂鱼,红烧块鱼,鲫鱼汤。煮杂鱼里有好多虾子、蚬子、

小螃蟹,很诱人地装在大盆里。我们高田上人家是很难吃到这么透鲜的美味的。舅舅坐在桌子上首喝小酒,吃鱼、剥虾,慢条斯理。舅舅和表姐都是整条鱼进嘴一抹,整条鱼卡就吐出来了。外婆吃得很慢,还时不时把油灯挑得亮亮的。

外婆睡在灶披的里一间,表姐睡在西房。舅舅睡在屋外搭的披子里,芦柴笆子门。除了一些农具,他睡的床很干净。每次我去,他都要拉我睡在他的脚头。他讲什么我都爱听。舅舅的见闻很多,尤其是大上海的,外滩、十六铺、黄浦江,英租界、法租界,麒麟童、梅兰芳、马连良……还有他读过的三国、水浒、封神榜、聊斋。

舅舅曾在上海一家面粉厂做管账的。1952年,他离异,带着表姐回到西坝头。从人民公社化开始,一直当生产队会计。他是西坝头最忙的人。大队文娱宣传队的“三句半”“对口词”“表演唱”……直到排练革命样板戏,都是他导演,还教年轻人拉二胡、吹笛子,鼓怎么打,锣怎么敲,镲子怎么击,教他们练些把子——蹉步、跑圈、亮相、踢腿、单蛮子。他的二胡拉得婉转脆响,扬剧小开口、大陆板、剪剪花……是东坝头、西坝头的第一把调。

舅舅为人家写寿幛、婚帖,“上梁正逢黄道日,竖柱巧遇紫微星”……过了腊月二十,日夜写春联。字体是端正正的正楷,看上去喜庆。西坝头家家户门上都贴他写的字。他一年到头有请吃喝,也不缺女人给他缝补衣衫,在西坝头过着安安稳稳的生活。

舅舅写的“西坝头”三个字,勒刻在一块磨盘大的圆石头上,至今还在西坝头的圩坝边立着,斜对鱼簖,红漆没了,字迹还在。

哑巴哥哥

□ 李凤琴

老伴也勤快,凡事总习惯提前筹划,每到农忙时节,早早安排好每日农活,年年麦收秋收,他家庄稼总比邻里收割得早、打理得利落。

哑巴哥哥心灵手巧。早年乡民赶集,都爱拎着篮子购买油盐布匹等。哑巴哥哥用柳条编的篮子,做工规整,丝毫不逊色集市售卖的成品。家中扫帚、锅刷,都是就地取材,以芦苇细秆编成,结实耐用。

瓦工、木工活,他也精通。自家鸡窝猪圈全是他人砌造,家中桌椅板凳也是他亲手制作,铁锹、铁耙的木柄若是损坏,他寻一截粗木棍刨平打磨,装好铁器便焕然一新。

小时候农家烧饭全靠柴草,麦稻秸秆需要堆成草垛以备常年取用。堆垛讲究方法,垛形端正方能防风防潮。哑巴哥哥码起的草垛坚实规整、雨淋不透,邻里谁家堆草垛,总登门请他帮忙。

农村男人干的农活哑巴哥哥样样精通,细致的家务琐事他也得心应手。后来我母亲离世,与哑巴哥哥相伴大半生的老伴也离他远去。每逢端午,父亲总要登门找他包粽子,他包的粽子个头匀称、软糯香甜。一来二去,两位老人竟成了师徒,父亲跟着他慢慢学会了裹粽子。

哑巴哥哥不会说话,却把日子过得踏实丰盈。他用一双巧手与善良,活成了乡间最温暖动人的模样。

外婆若是还在世,该有一百多岁了。印象里的外婆,个子不高,微胖,满头白发齐耳,脸上总是挂着慈祥的笑容。夏天爱穿白色的确良盘扣对襟褂子,冬天常换作蓝色棉布面料的斜襟袄子。老太太八十多岁时,依然耳聪目明,腿脚利索,牙齿一颗也没掉,还能“嘎嘣嘎嘣”地嚼蚕豆。她给人的印象,从头到脚都是清清爽爽的。

外婆家住在隔壁村,按现在的路算,近得很。可我们小时候,那是一段不近的路程——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乡下,尽是坑坑洼洼的土路,窄得错不开身,还要绕过一条河才能到。外婆生了三个儿子、两个女儿,我母亲是“老巴子”,所以外婆格外心疼她。每年春节去外婆家拜年,她总要留我们住上好几宿。晚上大人们问我愿跟谁睡,我总是不假思索地说:“跟外婆睡。”说不上为什么,就是喜欢。外婆冬天总把床铺得厚厚的,只要出太阳,她就起床褥和被子拿出来晒,到了晚上钻进被窝,又暖和又舒服,还带着太阳的味道。外婆总爱把她的棉袄搭在我的被窝上,临睡前还细细地帮我掖好被角,生怕我冻着。

外婆的房间隔壁是灶间。每天清早我还在被窝里,就听见她在灶间忙活一家子人的早饭了——稀饭在锅里“咕嘟咕嘟”地翻滚,咸菜下锅时“嗤嗤啦啦”作响,灶膛里的

在界首老街,提起易三爷,上了年纪的街坊无人不知。记得我小时候,界首老菜场门口本来有两个修鞋的老师傅。后来,一位师傅生病走了,现在就只剩下易三爷还在摆摊。

街坊邻居的鞋子无论是脱线、掉扣、开胶还是断底,不找别人修,也不愿随便换新鞋,大家都把鞋子送到易三爷这儿,信得过他的手艺。他做事踏实细心,修得结实耐穿,收费还特别实在,从来不乱加价。

易三爷没有门面店铺,就在街口摆个小摊,一张小马扎,几样简单

易三爷

□ 盛有香

的修鞋工具。下雨天就撑一把大伞遮风挡雨,安安静静待在路口,守着这份老营生。

修鞋本是易三爷的祖传手艺,他十八岁便接过家学,拜师精进,做起了修鞋学徒,一晃几十年过去,如今已经82岁了。

易三爷一直瘦瘦的,只是岁月催人老,脸上多了许多皱纹,背也慢